

##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优势”

### 分析与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

漆光瑛

我国1991—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10年规划提出：“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来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这里所包含的“分工、优势”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7—19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

英国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处于发生到成长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在反对封建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还探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其中，从分工和优势来探讨资本主义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一分析，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今天，它仍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 (一)

怎样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增加国民财富，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到分工的作用，将分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

威廉·配第，这位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曾以织布为例，来谈分工的作用。他说，如果将织布生产中的梳清、纺纱、织造、拉引、整理和包装等操作分给几个人去做，比只是单独一个人笨拙地去完成其全部操作，劳动生产率必然较高，所花的成本一定较低。配第的这一见解曾为马克思所肯定，称他是把分工当作生产来阐述。●

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更将分工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经济理论的分析就是从分工的分析开始的。他特别强调分工，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sup>②</sup>他指出：“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sup>③</sup>斯密还认为，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大城市的分工程度往往要高于一般的城市和农村。他还注意到，交通运输状况，直接影响分工的程度，“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sup>④</sup>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对于分析我国各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从我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统一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了广泛地促进分工以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必须同时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理地发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当前，在欧洲共同体中，一些国家在经济结构上都有自己的特点而形成相当发达的地区分工。例如，构成经济结构领导产业的，在德国是电子、汽车等产品生产，在法国是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在英国是纺织品的生产，在此基础上形成国

家之间的分工（这实际上相当于我国的地区分工），从而促进了经济共同体生产的发展。但在我国，并未形成这样的格局。相反，由于各地区竞相发展某些相同的产业，例如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使得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据统计，1980年28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40个工业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行业产值结构的平均相似系数高达0.83，1985年为0.80，1988年为0.81。<sup>⑤</sup>同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仍存在地区市场封锁、地区分割和追求自成体系的情况。要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要促进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根据各个地区绝对和相对的优势，迅速改变上述地区间分工程度不高、分工不合理的状况。

第二，广泛地发展地区内部的分工。在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发展地区内部的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东部沿海地区及其大城市，经济发达，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差。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发展造成的差异，也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从后者来看，各地区内部分工程度的差异是一大原因。东部沿海地区及其大城市，其内部往往有较好的专业分工，分工程度高。上海这个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在工业生产上，它不仅有一批各种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按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实行各车间各工艺的分工协作，而且，还有许多街道弄堂小厂及郊县和邻省市的联营厂，大厂只生产产品的主要部件，其他许多零部件则分散到小厂或联营厂去加工，因而能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例如，上海自行车三厂生产凤凰牌名车，它将10个零部件拿到上海近郊的宝山区的13个专业化生产点去生产，还在那里新辟了一个生产小轮车的专业厂。正是这样分工专业化的生产，使该厂既增加了自行车的品种，又提高了产量。所以，应在各个地区内部根据各自的情况，创造条件，促进这样的分工，以发展经济。

## （二）

英国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的形成和发展，应基于各自的优势。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花费的代价比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在家内生产。裁缝不想自己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去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佣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斯密主张，为了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应当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sup>⑥</sup>，而以其劳动生产物去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他认为，这个原则，对商品生产者是如此，对一个国家也应当如此。由此，他提出以学术界称为“绝对成本说”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

尽管斯密的思想是从“利己心”出发，是从资产阶级视野来看待分工问题的。然而，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思想，即从经济意义上说，分工的合理性必须考虑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这种优势，正如斯密所分析的，既有自然的优势，又有后来获得的的优势，前者是指气候、土壤、矿藏及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环境等等；后者是指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技术等等。由于发挥了这些优势，就能使商品生产者或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从而在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所以，应当专业化生产自己（或本国）拥有优势的东西。

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提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地区分工和协作的经济布局问题。经济布

局的合理性, 必须注意发挥各地区的优势。我国自然条件复杂, 资源分布不平衡。从土地资源看, 山地多, 平地少, 其中, 高于海拔500米的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4, 大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方便。从水土资源看, 北方地多水少, 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63.9%, 而水资源占全国总数的17.2%; 长江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36.1%, 水资源占全国总数的82.8%。资源的分布和生产力的布局不够协调。东部地区工业城市集中, 但原材料、能源严重不足; 西部资源丰富, 例如, 全国煤炭保有储量的68%是集中在晋、陕、蒙三省区; 全国可开发水能源的67.8%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但是, 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较落后, 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低。上述状况,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的优势状况是不一的。也就是说, 东部沿海地区有“后来拥有的优势”, 即生产技术力量较雄厚, 产业基础好; 西北及西南地区则拥有“自然的优势”, 即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分布、生产发展水平及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 要求在生产力合理布局、实行地区合理分工时, 要注意扬长避短, 使各地区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 从合理的社会分工中得到收益。例如, 西北地区以黄河上游水电开发为先导, 可形成水火共济的能源、原材料综合生产基地; 新疆塔里木盆地发现大量“海相生油层”, 在西北地区可建立石油化学工业基地; 在西南, 乌江流域水力资源丰富, 铅、磷、煤等矿产资源与生物资源并存, 综合开发条件优越, 可建立贵州能源、原材料基地; 四川的“三江”流域(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广西的红水河流域都有建立能源、原材料综合开发基地的优势。

同样, 在各个地区内部, 也存在着不同的“自然优势”和“后来拥有的优势”, 应据此来发展内部分工, 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 (三)

在阐述发挥优势、实行分工时, 英国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分析。

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成就最大的学者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 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 明确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思想。他认为, 商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为了自身的利益, 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来实行社会分工。他说, 如果有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 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中都比另一个人强, 不过制帽时只强五分之一, 即强20%; 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一, 即强33%。那么, 这个人就应专门制鞋, 而较差的另一个人就专门制帽。通过交换, 双方都能得到更多的鞋和帽。<sup>⑦</sup>所以, 这样的分工, 对双方都有利。他继而指出, 每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比较成本说”, 将资产阶级的国际贸易理论推进了一大步。

诚然,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思想是为其国际贸易理论服务的, 而后者又是力图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理论工具。然而, “两优取其重, 两劣取其轻”的比较优势思想, 包含了合理的因素。这有利于无论是处于优势或处于劣势的商品生产者或是一个国家, 在考虑分工时, 都应注意用最小的劳动耗费, 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种思想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当前,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三个经济地带, 即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和西部地带, 形成了按东、中、西梯度层次的倾斜布局, 要求以东部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带的开发。目前, 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三大经济地带, 按人均工农业产值计算, 比率大约是1:0.59:0.45; 按人均工业产值计算, 比率大约是1:0.50:0.36。据1985年统计, 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11个省市)人口

为3.58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4.31%,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3.04%,人均产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5%。而西部地带(包括新、藏、青、甘、宁、云、贵及四川西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据1985年统计,该地带的人均工农业产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73%,是东部平均水平的38.9%。<sup>⑩</sup>今后,各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要上个新台阶,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要逐步缩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需要。在完善生产力布局、完善地区分工协作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绝对优势外,还必须注意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

总的说来,就绝对的条件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对外交流广泛,工农业发达,资金雄厚,劳动力素质高,智力密集,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但是,地少人多,资源紧缺,能源供应不足。以上海为例,上海经济发展所需的一次常规能源——煤、石油、水力的储藏和生产基本上缺乏,消耗量大。据统计,1981年工业产品成本中,能源、原材料及其他物资消耗的费用占86.39%,1982年接近88%。每年所消耗的“一次能源”,折算为标准煤约2100多万吨,其中煤炭1100多万吨,其它为原油、油品、煤气。“一次能源”要靠其它省市支援,煤炭主要来自山西、河北、安徽、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省,它们中约70%经中转港由船运到上海,约30%由火车运达。原油和油品由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等运入。大量能源资源和产品远距离运输,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继续调整和提高,势必严重地影响上海今后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中西部地区,国土辽阔,能源矿藏资源丰富,但是资金短缺,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例如,西南的矿藏资源多、数量大,已探明保有储量居全国前茅的,四川有铁、钛、钒、铂等25种,贵州有汞、光学水晶、磷、稀土、煤等15种,云南有铅、锌、锡、钾、铜等20种;广西有铝、膨润土、锑等28种,这些矿资源分布集中、共生伴生、配合配套,有利于综合开发。水能资源也居全国首位,并具有流量大、落差大、开发条件好的特点。然而,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低,初级产品比重大,结构松散,综合利用率低。西南的交通运输尽管有连接中、西、东北部的铁路干线,但技术标准低、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尽管已形成经济区内的公路运输网,但道路等级低,30%的道路晴雨两阻;尽管有700多条主要河流,但内河航运等级低,港口设施落后,吞吐量小,所以投资环境差。西南的贫困地区面广人多,资金严重短缺,川、黔、滇、桂四省区中,除四川外,都要靠中央财政补贴。而且,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运用资金的能力及效率低。劳动者的专业技术和文化技术的整体水平低。据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2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占23.5%,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口与京、津、沪相比差距达2—7倍。所以,在上述总格局下,存在着经济发展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东部沿海地区,在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上面具有优势,加工工业特别是轻加工工业更发达,因而,发展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以及出口创汇的产业,是最具优势的,这应成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而一些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多、运量大的产业就优势相对较小,因此应逐步转移到能源充足、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样,西部地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在各种产业的发展上处于劣势,却有着丰富的能源和资源;加工工业发展不如东部地区,但在国防科技工业、重加工工业方面拥有科技人才和装备;内地交通不便,但却拥有向西开放(发展与苏联、东欧、西亚、南亚、阿拉伯国家的交往)的区位优势,这些因素使该地区的与之有较密切联系的各种产业劣势较小,甚至具有相对优势,因而可以发展。今后,应加快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农牧业的开发,发展该地区有相 (下转第24页)

力资本主要受二种因素制约：一是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传统制度，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如“离土不离乡”等观念对人的束缚。但可以肯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通过人员迁移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日益加大并显示出其重要性。

#### 四、体制变革与我国人力资本的有效增长

在以上各部分内容的分析和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体制改革的背景和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考察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形成，同样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即适应人力资本有效增长的制度环境。西方经济学家因其本身就处在这种既定的有效制度下，往往在其研究中忽略了制度因素；而我国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增长并发挥作用所赖以实现的体制变化则是我们能深切体会到的。可以说，在我国，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而为人们逐渐认识到的。

一般地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直接与投资者的收入预期有关，而这种以一定投资获得一定收入的理性预期直接得益于市场制度调节的有效性。从理论上说，倘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人们也不可能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即使通过他国的示范经验认识到，但当制度还不能保证投资者的预期收入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肯定是不足的（表现在政府的投资行为上）或根本忽视的（表现在公有制前提下家庭或个人的投资行为上）。因此，人力资本的有效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均有待于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为基调的体制变革是否能有效推进和最终完成。据此也可以认为，人力资本的有效增长，是指有特定社会制度的适应，以一定水平的物力资本为条件，在与物质资源、货币资金的合理配置中完成的。而我国人力资本有效增长所要求的制度适应包括在市场取向改革为基调下的一系列具体体制的调整，主要有：教育和研究体制、社会流动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从长期看，这些制度变革或体制调整后是否能有效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待于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在观念上的适应。

① [法]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详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第182页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此处归纳受厉以宁教授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参见厉以宁：《教育经济学》，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 此处归纳主要参考了美国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布鲁斯·赫里克所著《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的有关内容，但对“研究”的归纳则参考了“人力资本论”首倡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有关论述。

（上接第43页）对优势的、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行业和产品。

总之，国家应当根据这种绝对和相对优势的分析，制订地区发展规划，从全国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实行东、中、西地区的优势互补，实现东、中、西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①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2页。

②③④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5、7、17页。

⑤ 资料来源：《我国90年代的区域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1990年第12期。

⑥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8页。

⑦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114页注。

⑧ 资料来源：《生产力经济学教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178页。